



「大象」與「鯨魚」-- 卡爾·巴特 (Karl Barth) 與艾彌爾·布魯諾 (Emil Brunner) 糾結關係終獲完美結局的故事

Prof. Dr. John Hesselink
(約翰·赫瑟林教授)

威士登神學院榮譽教授

林昌華譯

Abstract

“Whale and elephant, these two creatures are too different, it is not possible for them to communicate or even to fight” these are words from Karl Barth who answered the BBC reporter’s question about his attitude towards his theological rival Emil Brunner. Is it true that different theological opinion make people irreconcilable? This is the question which John Hesselink, Barth’s supervisee and Brunner’s friend, attempted to overcome. This is a translated memoir written by John Hesselink (Albertus C. Van Raalte Professor Emeritus professor of 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 MI) on his endeavor to reconcile between theological rivals such as Barth and Brunner. His attempt did not succeed on theological issue, but created a friendly personal encounter between Barth and Brunner. In certain point of view, this is reconciliation between old foes, therefore succeed in personal level.

Keywords: Whale and Elephant, BBC, Karl Barth and Brunner, Natural Theology,
Tokyo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



譯者前言

2005 年，筆者前往美國密西根州威士登神學院（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 M.I.）求學，是筆者與荷蘭改革宗教會（Dutch Reformed Church）第二階段的接觸。撰寫論文時，學校以我的論文主題，在於處理 1618 年荷蘭改革宗教會「多特會議」的神學爭議，應該是屬於系統神學的學門，因此指派赫瑟林教授擔任我的指導教授。赫瑟林是美國歸正教會（RCA）著名的系統神學學者，曾經多次來台灣講學，可惜筆者當時牧會忙碌，未能報名參與「赫瑟林講座」聽他演講。後來在撰寫論文之時，多次在威士登神學院圖書館樓上，赫瑟林教授的研究室裡，望著逐漸沒入密西根湖的夕陽，聽著指導教授分析我所撰寫的讀書報告，然後建議研究的方向。他那深沈語調的睿智言語，對於當時對神學一知半解的我來說實在獲益良多，也讓我感受到神學的浩瀚無涯。10 年之後的現在，回想當日受教的情景，彷彿只在昨日。一年之後順利完成學業獲得神學碩士學位，在離開美國前夕，才得知我在美國一整年的學費和生活費，都是由教授夫人的家族所提供，因為受到赫瑟林教授家族的照顧，內心著實感到無比的感激。赫瑟林教授雖是美國人，但是長時間在日本擔任宣教師，因此他的學術風格比較像是一位按部就班，踏實研究的日本學者，他實在是值得我一生學習的學術典範。本文是赫瑟林教授投稿美國歸正宗教會期刊的回憶錄，徵得作者的同意翻譯為中文，希望能夠讓台灣的教會瞭解 20 世紀中葉，西方基督教神學界一個重要神學爭議的些許端倪。

本文

巴特的神學和為人對我的一生具有不可磨滅的影響。這個影響又和同為瑞士神學家的布魯諾糾結在一起。我打算要在這裡分享的，就是我如何參與在他們兩人的關係當中，特別是在他們生命晚年的時期。我個人和他們兩人的關係延伸將近 10 年的時光。由於身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大學生和 50 年代的神學生，巴特和布魯諾的名字對我們來講並不陌生，巴特是透過其響亮的名聲；而布魯諾則是直接透過作品。





對於一位威士登神學院的學生來講，布魯諾的著作《中保》(Mediator)《神聖的召命》(Divine Imperative)以及他的《教義論的第一卷：上帝的教義》(The Doctrine of God)是我們的必讀經典。神學院三年級時，我曾撰寫一篇《巴特教義論第一卷》第一章裡面有關啟示論的期末報告，當時這卷書是巴特著作中唯一翻譯成英文的一卷書。

這兩位神學巨擘的作品實在讓我印象深刻和嚮往，然而，由於來自保守改革宗信仰背景的關係，有時候我也必須承認，他們著作中有關聖經權威本質的主張，讓身為讀者的我覺得不太舒服。雖是如此，我從來也沒有預期會有一天，與這兩位神學巨擘相見，更不用說受教於兩人名下作研究了。

讓我意外的驚喜是發生在畢業後的4個月，也就是1953年9月，我們以宣教師的身份到達東京時得知就在一個月之後，布魯諾夫婦將要前來東京。布魯諾博士是東京新成立的「國際基督教大學」所聘請第一位教授基督教與倫理學的訪問學者。不久後報紙宣布布魯諾除了對國際基督教大學學生的講座之外，他也將針對一般的聽眾在每個星期六早上以「基督教與存在主義」為題進行一系列的演講。除此以外，他也將為20名以內的研究所學生主持講論會。我們的家庭受派前往東京學習語言，由於課程的安排是週一到週五，因此在週六時我有空可以參與布魯諾的特別演講，並且幸運的被接納參加他所主持的講論會。

這種機緣只是我後來與布魯諾教授及他的家庭漫長又密切關係的起頭而已。這種關係隨著後來數位宣教師的參與而轉往布魯諾教授宿舍舉行，在那裡我們的關係隨著非正式的神學討論會而深化，而我們兩個家庭也因此建立進一步的友誼關係。

1955年春天布魯諾因為夫人身體欠安離日返回蘇黎士。在回程中布魯諾自己也染病中風，當時他已辭去蘇黎士大學的教職。儘管中風影響部份身體機能和參與學術活動的機會，我們仍然持續的通信。當時我開始尋求進入博士班階段研究的任何可能性。假若布魯諾的身體仍硬朗可以擔任指導教授，那我極有可能在他的指導之下作研究。

由於因緣際會的機遇以及另外一位瑞士宣教師朋友，已故的威那·柯勒 (Werner Kohler) 鼓勵下，我被卡爾巴特教授接納成為博士候選人。但是巴特告訴我，他不確定會繼續在巴色大學擔任教職多久。當時是1958年，因此如果我願意冒這個險的話，



他也願意照原先的規劃進行。他表示對於我所提的論文題目：《加爾文的律法觀》極感興趣。當我把這個信息告訴布魯諾後，發現他非常生氣和沮喪，他怕我會變成另外一位「巴特主義者」(Barthian)。針對他的質疑，我提出辯護表示，自己在神學上已有定見，然後再反證說明，即使我崇敬並且和他(布魯諾)有深厚的友誼，這個關係也沒有讓我變成「布魯諾主義者」(Brunnernism)。聽完我的說明之後，布魯諾內心得到釋懷，並且開口向我道歉，也表達希望我能儘早再去拜訪他們家庭。

根據布魯諾的建議，我在1958年10月到達巴色，將行李放在神學校友會館(Das Theologische Alumneum)。那個會館由神學家奧斯卡·庫爾曼(Oscar Cullmann)和他的姊妹管理，而那裡將會是我未來5個月在巴色的暫居之所。完成巴色的行程之後，繼續前往蘇黎士。我在巴色渡過到達瑞士後的第一個週末。數日之後，依照先前的約定，我首度與將來的指導教授巴特正式見面。由於首度見面乃是禮貌性的拜訪，短暫交談之後隨即告別，那次的見面我並沒有向巴特提及自己與布魯諾友誼關係的任何信息。幾個月後，我從非正式學生身份開始博士論文的撰寫。

然而，每當我拜訪布魯諾時(後來加上我的妻子和3個小孩)他總是很期望知道巴特在講論會中的作為，他的《基督教教義》進行得如何。有時候會表達出對巴特神學某種觀點的誤解，但他也表達出對巴特神學高度崇敬的態度，我還記得最初我和布魯諾散步時會話的情景。布魯諾突然停步，轉向我，說：「你知道有幾位優秀的神學家，如布特曼，田立克，但是在我們當中只有一位是真的，那就是卡爾·巴特」。

後來，巴特終於知道我與布魯諾的友誼關係，那是一位在巴色唸書的美國學生與巴特見面時，無意間提到在不久前，我曾帶領一個神學生研究小組前往蘇黎士，在布魯諾家中相處一夕的經驗。幸好，我當時與巴特的關係已經相當穩固，這個意外的插曲沒有危及我們的友誼。相反的，巴特後來曾數度請求我，將來拜訪布魯諾之時，代替他向布魯諾表達請安之意。如果不是後來布魯諾夫人代其夫主動伸出友誼的手的話，那麼上述的情況大概就是這兩位神學巨擘關係和解的最高程度。

1960年秋天，一組來自倫敦英國廣播電台(BBC)的記者、攝影師和技術人員跨過英吉利海峽前往瑞士。他們採訪的目標既不是日內瓦的國際政治集會、也非重要的運動賽事，而是採訪兩位當時代最有影響力和優異的神學家：艾彌爾·布魯諾與卡爾·巴特。這兩個人各用一個小時的時間在家裡接受訪問。而兩段訪談錄影於1961



年1月英國廣播電台節目中合併播出。毫無疑問的，訪談記者事前已經作過神學家背景的簡報，對兩人的關係有相當程度的理解（布魯諾已經事先接受過訪談），所以他們在訪問巴特作為訪談兩位神學家的結論時，記者提出別的神學家也相當好奇的問題。記者詢問巴特，是否能夠描述或解釋他（巴特）與艾彌爾·布魯諾的神學爭議與兩人間的關係。記者提出這個問題實在很適當，因為兩人間有許多共通點，包括國籍、年紀（巴特大3歲）、研究領域（教義學）和地理位置（蘇黎士和巴色相隔60哩遠），更重要的是，兩人當中一位是辯證神學的領袖，而另外一位是新正統派運動的領袖。然而，兩人的關係卻是相當疏離，甚至有時在神學領域的關係是敵對的。因此，巴特很明智且半開玩笑的提出相當具有份量的回答。

巴特說：「在上帝美好的創造物中，有兩種體型巨大但差異極大的生物：『大象』與『鯨魚』。上帝並不認為這兩種生物的差異有什麼問題，因為兩種生物各有其功能與目的。但是，由於兩種生物的差異過於巨大，所以它們之間根本無法溝通，甚至連戰鬥也不可能。結果就是，這兩種生物沒有辦法也不需要簽訂任何的『和平協議』。為何上帝將這兩個差異如此巨大的物種放在同一個世界當中，沒有人可以瞭解。如果真的要獲得解答，非得等到世界末日的時候，自然就會理解為何上帝創造大象與鯨魚的目的。」巴特說：「或許這個比喻可以幫助你們了解我和布魯諾之間的關係。」而訪談也到此結束。在訪談結束後非正式閒聊時間，記者進一步追問：「巴特教授，那麼這兩種生物當中，你比較希望當哪一種？」，巴特沉思片刻，然後回答：「我寧可當一隻鯨魚，大象被侷限在陸地上，而鯨魚可以優游於洋海之中。」

雖然兩位神學家因對於「自然神學」的不同詮釋所產生的衝突可以說是極為激烈，但是兩位神學家的裂隙不僅止於此。舉例來說，1932年當巴特《教會教義學，第一卷》出版時，巴特在序言當中表示，他已經遺棄齊克果和存在主義哲學，並且更認真的思考初代教父，特別是坎特伯利·安瑟倫（Anselm of Canterbury 11-12世紀的英國神學家）的思想。而布魯諾針對巴特《教會教義學》第二章，批判巴特的主張。他（布魯諾）甚至提出有別於巴特，對神學上的「功能」和「目的」截然不同的主張。事實上，這兩個人對教義的基本立場並沒有很大的差異。因此，如果將這兩位神學家的主張和同時代的布特曼或田立克相比時，會發現兩者的觀念很類似。但是他們不一致之處，有時卻是非常的強烈，兩者的差異顯現在對以下議題的不同主張，包括：



「人觀」，「倫理學」，「教會論」，「揀選教義」，「存有的比喻」（*analogia entis*），「童女生子」，「律法與福音」等議題。這個「同中之異」（*aus eind andersetzung*）持續四十年的時間。但是兩人之間卻也很少直接發生衝突，儘管他們的爭論非常尖銳，但總是透過「筆戰」而非語言上的爭論（事實上兩人地理上的區隔至少 60 哩之遠），這些神學爭論從來沒有演變成為口語上的辯論。巴特與布魯諾的關係，正如巴特的喻言所描述，「大象」與「鯨魚」兩者間根本無法也無須溝通。儘管兩人各種條件非常接近，但是他們的學術路徑沒有任何的交集可言；就算有，也只能算是意外的火花，例如 1948 年兩人同時出現於普世教協大會（WCC），他們再度於 1953 年在蘇黎士機場見面，那是巴特在布魯諾出發前往日本前，前往機場向他道別。

除上述的情況外，兩人之間第一次真正具有特別意義的“會遇”（*Encounter*）發生於 1960 年 11 月 19 日。由於布魯諾夫婦答應我們，只要他完成第三和最後一卷的《教義學》書稿後，就會「長途旅行」到巴色來訪問我們。1960 年 10 月，布魯諾夫人來電敲定來巴色訪問的細節（當時教義學第三卷剛面世），然後她提及布魯諾教授的建議，既然已經來到巴色，那麼有機會可以拜會巴特教授，那將會是一件他所期待的好事。布魯諾博士計畫將《教義學，第三卷》呈獻給巴特作為見面禮。他們問我的建議如何？假若此事可行，是否我可以作些必要的安排。

我原本計畫先將此構想與巴特的秘書 *von Kirschbaum* 討論。於是去電告知此事（她總是會親自接電話）；但是出乎我意料之外，這次的電話由巴特親自接聽，於是我沒有迴避，脫口說出我代布魯諾傳達的信息。我立刻從巴特口中得到這樣的回應，他這樣說：「*Ach was ! ein gross historische Ereignis*」，直譯的意思就是：「啊，這將會是歷史性的聚會」，口氣表達出極大的意外和驚喜。於是在這種和善的氣氛下，我樂於扮演巴特和布魯諾的聯絡人角色。就在預計的時刻逐漸接近時，我清楚的觀察到，雙方的預期心理和情緒上的焦躁不安。就在預計見面的前幾個禮拜開始，只要巴特看到我時，總是會停下腳步，詢問我一切是否仍按計劃進行，然後也會問我屆時是否願意相伴；相反的，布魯諾的心情則是顯得比較自在。事件最高潮景況發生於預期見面週六的前兩天晚上。在非正式的講論會下課時，巴特作勢要與我講話。若不是瞭解多年以來巴特與布魯諾間缺乏互動的實況，他的要求看起來實在是極不真切。巴特將手放在我的肩膀上，相當熱切的說：「赫瑟林先生，你對布魯諾的瞭解比我多，當



他來訪時我要說什麼話？」面對這個問題我不禁啞然失笑，然而顯然巴特不是在開玩笑。於是我對他提一些建議，在談話結束之時，巴特結論說，那麼有兩個主題是絕對不能觸碰，那就是「自然神學」和「共產主義」！

就在歷史性的會面時刻，我和布魯諾夫婦相會於火車站，然後由我引領他們前往巴特的住宅，先前雙方已經同意訪問的時間不會超過一個小時。顯然此時的布魯諾內心極為緊張，他的動作顯露出上次中風對他的影響。按鈴之後，巴特非常溫暖真誠的應門，這個舉動驅散了布魯諾心裡的不安。那個會面真是個令人動容的時刻，由於巴特和布魯諾夫人已超過 40 年沒再相見，最初試探性的話題顯得有些生硬，像是青少年男女的首次約會。但是，隨著太太們逐漸消除陌生感而開始熱切的談話之後，男性們也自在開懷的討論各樣的神學議題。巴特的秘書 von Kirschbaum 小姐是唯一在場的局外人，於是開始對我談話。為了與她對話，我無法專注巴特與布魯諾的談話內容，實在可惜。

接近中午時分，布魯諾夫人提議他們應當要離開了。巴特轉向我，眨眼說道：「我們正在討論共產主義」，我微笑轉向布魯諾，說：「是的，我們應當離開了」，天空下著微雨，巴特與布魯諾愉快的合照，這是阿姆斯特丹大會之後兩人首度的合照，兩人的熱切笑容甚至比後來的道別更為感人。當我們駕車離開時，巴特站在人行道上歡喜的揮手直到我們從視線消失為止。當時他的面容閃耀著天使一般的光彩。

用完中餐休息片刻後，布魯諾夫婦拜訪我們在巴色的居所，隨後隨即返回蘇黎世。在用餐時或拜訪我的居所時，少有機會討論布魯諾與巴特「會遇」的感受。前往車站的路途中，布魯諾夫人忍不住好奇詢問先生，會談期間討論甚麼問題，布魯諾想了一下，然後笑了出來說：「你看，我幾乎全忘記了」。

然而，故事沒有在這裡結束。後來有人詢問巴特與布魯諾教授，對此次見面的感受，布魯諾夫婦對於此次「大膽舉動」如此成功，讓他們極為歡喜。當巴特得知布魯諾的反應之後，也表示這是雙方共同的感覺。然後他帶著微笑溫和地說：「現在我的內心有平安了」。

部份人聽到巴特與布魯諾見面的事情，詢問這兩人是否得到真正的和解？答案是否定的，這有兩個理由：在神學上這不可能發生，正如巴特在見面之前所說的話：「有太多的水在橋下流動」，就個人來講，並沒有和解的事情發生，因為沒有必要。儘管



他們神學立場互相鄙夷，但是他們之間沒有真正的敵意存在。然而，此次的見面經驗對兩位優秀的神學家來講意義十分深遠，正如布魯諾回答夫人的話所暗示的，他們討論的內容並不重要，比較重要的是他們不再以文字攻擊對方，並且最後能夠像兩位基督徒紳士般坐下來討論神學議題。因為神學家也是有罪的人，也有奇怪的癖好，和可笑的小瑕疵，他們就像一般人一樣需要被了解與赦免。

由「不」(Nein)到「是」(Ja)

巴特與布魯諾的「會遇」是他們在此生的最後一次見面。1961年6月，我完成博士論文並且通過口試後離開巴色，經由美國返回日本。在此之前我收到東京聯合神學院教授「歷史神學」的聘書，我在那個教席的時間是由1961年10月到1973年5月，直到我應聘回美國擔任密西根州荷蘭市威士登神學院的院長為止。儘管新任職務的壓力使得我無法經常與巴特和布魯諾兩位教授通信，然而我們的聯繫並沒有中斷。

1963年秋天，東京的英文報紙《朝日日報》打算發行有關基督教對於「和平」這個議題主張的特刊，日本方面他們邀請我的同工「東京聯合神學院」院長Hidenobu Kuwada發表主要的文章，然後在Kuwada的建議之下，他們要求巴特回應，我在這當中擔任協調人的角色，並擔任雙方文章英文翻譯的編輯人。(巴特的回應可以在他的書信集，第74通信中看到)。

1966年春天，我突然接到來自布魯諾夫人的長途電話，詢問我是否願意擔任布魯諾的代表人，領取「東京基督教大學」在春季頒贈的榮譽神學博士學位。她解釋因為布魯諾的身體不好，沒有辦法親自旅行去日本領受學位。因此我只得「出面」(stood in)代表布魯諾在ICU春天的集會時領取這個學位，並且希望能稍後前往蘇黎世與布魯諾家人分享當日的盛況。

我很期盼能夠與我兩位神學上的恩師見面重敘，因此我安排在1966年6月起，有一段時間的休假。但是很不幸的，布魯諾在我們出發前過世，我們倒是能夠於7月到達瑞士時拜訪布魯諾夫人。從她的口中知道在布魯諾教授過世前一個月，巴特教授表達出無比的善意與關懷。顯然巴特在那年初春時也遭受身體病痛的折磨，因此也無





法前往蘇黎世，但是他提供自己的醫生（他顯然是布魯諾所染患疾病方面的專家），這讓布魯諾夫婦極為感動。

在那段時間巴特夫婦並沒有住在巴色，而是在他兒子克理斯多福的岳母位於 Madam Frommel 的 chalet。我用電話和他們連絡，而巴特期盼如有可能，去拜訪他們。於是我們敲定時間，就在一個溫暖潮濕的下午，我在巴特夫婦的居所受到熱誠的歡迎。稍事寒暄之後，巴特說：「你知道，我們的朋友布魯諾已經離開這個世界」，接著他短暫的回顧了和布魯諾的關係，也表達沒能在過世前訪問他的遺憾。然後我們討論其他許多問題，諸如他正在撰寫的自傳，但是他相信這只能待他的子孫來完成了。

我在傍晚返回巴色。那是我最後一次與巴特見面。這次的拜訪最讓我感到驚異的是巴特第一個想要和我談論的是布魯諾過世的事情。儘管這是新近發生的事情，但是並不是我先提起這個話題。我們已有五年沒有見面。但是見到我讓他立刻回想和布魯諾最後一次見面的情景。

在那當下，我覺得有一個問題很重要，於是間接的探詢：「1960年11月的歷史性的會晤讓他們解決神學的歧異嗎？」，從巴特口中，我所得到的回答是辯證式的「有和沒有」。就「沒有」來講，他們的見面並沒有解決任何神學上的問題。儘管他和布魯諾對神學基本立場非常類似，但是他們之間的神學差異實在過於巨大。因此就算有，也沒有辦法在幾個小時的見面當中得到解決；就「有」來講，這次的見面讓他們打破了個人溝通的壁壘。對巴特和布魯諾來講，那次的見面以及後來的幾年，代表的意義十分深遠。

然而，有些人並不是這樣看，舉例來說，Eberhard Busch 在他所寫的巴特傳記這樣說：「另一個同時代的人，想辦法促成巴特與他的蘇黎世的同工艾彌爾·布魯諾的共識終究歸於失敗，1960年11月19日，美國的宣教師約翰·赫瑟林（他剛由巴色得到博士學位）在 Bruderholz 安排一次的見面，結果讓人失望」。同樣的，這次的見面被其他的作者描述為「一次沒有必要，且充滿感性的合一」。然而這個事件實在沒有必要作各樣的詮釋。我認為這當中的重要意義在於巴特從正面的眼光看這次的會面，這點可以從巴特先前的學生 John Godsey 於會面隔年所出版的著作《我如何改變我的想法》當中得到進一步的證實。巴特在書跋當中，以不算簡短的篇幅描述那次見面的情況：



「雖然我們兩對夫婦在見面前，心情都是相當的忐忑不安，但是見面的結果卻是令人歡喜。我認為此次見面的意義，不在雙方神學的差異是否能夠得到和解的機會；而是在於能夠解消長時間以來兩人的猜疑，同時也藉著此次的見面，讓雙方的關係得到進一步的鞏固」（第 77 頁）。

這個說法將巴特與布魯諾的見面放在適當的脈絡之中。我相信，儘管他們的友誼很長一段時間受到曲解，但是兩人並沒有因此決裂。但是，兩人神學的差異，經常卻也為他們的關係帶來負面的結果，直到生命的終結。或許是因為這個事實使得 Busch 提及這個歷史性的會面時以「結果令人失望的會遇」作為註腳。因為在見面的 3 年前（1963 年 11 月 11 日），巴特寫信給布魯諾的兒子，蘇黎世教會的牧師 Hans Heinrich 哀嘆布魯諾在他最新出版的書籍《真理作為一種會遇，1963 年》當中重覆出現對他（巴特）神學上的指控。巴特寫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 H.H. 布魯諾不要受到父親指控的影響。巴特如此寫道：

「我對於你的父親在新版的《真理作為一種會遇》第 45 頁中提出對我的指控，讓我感到不安，裡面所指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粗暴的扭曲，先前我還期待和他之間或許可以得到某種程度的和解（編者加上註解：巴特和布魯諾個人的和解發生於 1960 年 11 月）難道這種事情沒有辦法停止或是避免嗎？H.H. 布魯諾，我想至少我應該告訴你，我對於這種重新燃起古老的忿怒之火並不愉快」。顯然 H.H. 布魯諾立刻以一種感性且理解的方式回應巴特，因為巴特在 11 月 21 日以一封信回應（第 129 號）對於他的努力表達感激之意。

另一個通信的記錄出現於 1964 年 10 月 26 日，是巴特寫信給某位布魯諾家族成員，書信中寫道：「當我能夠自由活動的時候，我將先找機會去拜訪，因為我計畫這件事情已經一段時間了」，很不幸的，巴特的這種善意從來沒有受到後來學者的重視。

巴特後來只直接寫一封信給布魯諾，這封信寫於 1965 年 1 月 29 日（第 175 號），這封信是回應布魯諾並表達理解的短箋，以及新近出版一本關於瑞士小說家 Gottfried Keller 的小書的回應。顯然巴特在信中表達，並不希望再度引燃年輕時期雙方的敵對之火，這是表達兩人已經和解的重要證據；因為在這本書當中布魯諾從自然神學的立場贊同 Keller 所提「良心」的重要性的主張。假若這事發生於更早的時候，定然激起巴特的暴怒；但是，這裡巴特只是簡單的提及雖然他已經對 Keller「失去所有的理





解」，巴特也對 Keller 所使用的「慾望」和「良心」的主張，表達懷疑的意見。他要布魯諾注意這位作家的錯誤，並不是對此事作強烈的批判！

一年之後，布魯諾的病況轉趨嚴重，巴特不再直接與布魯諾通信，而是與他的夫人以及蘇黎世 Fraumunster 教會的牧師 Pfarrer Peter 連絡。在 1966 年 3 月 7 日（第 204 號）的書信，回應她提到丈夫身體的近況時，巴特寫道：「妳的來信和艾彌爾添加的兩行字讓我非常的感動，（德文的原 N 表達得更為強烈 hat mich sehr bewegt）」，然後巴特用一節他最喜歡的聖經節表達他的情感，就是《哥林多後書》1 章 18 節：「我指著信實的上帝說，我的諾言並不是『是』而又『非』的」，在一段非常私人的段落當中，巴特反省兩人自身的情況，並鼓勵布魯諾倚靠信仰的應許：「哀哭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他在書信的結語寫道：「如果我的身體比較好，那麼一定會過去與艾彌爾講一些話，我祝福他也祝福妳，親愛的布魯諾夫人」。顯然這位老鬥士已經不願繼續與他的朋友和仇人作戰。相反的，在這當中有和其他書信極不相同的憐憫與溫柔，當中文字所表達的情感實在感人。下一封信，是布魯諾的牧師和摯友 Peter Vogelsanger 得到他病況危急消息之後。於 4 月 2 日寫一封長信給巴特通知巴特有關布魯諾病危的消息。此時巴特知道布魯諾已經來日無多，於是寫信回應。書信（第 207 號）的篇幅極為簡短；但是當中短短的兩段話值得完全引用如下：

「假如這兩年的病痛允許我稍為自由一點，我一定搭乘下一班火車再度去握艾彌爾·布魯諾的手，假若他還活著，告訴他我要牽他的手去上帝的面前，並且告訴他，當我想對他說『不』的事情，已經是遙遠的過去，而我們都只能依靠偉大而滿有恩惠的上帝，祂的慈愛對我們每一個人說『是』。」這封信就如同一個月寫給布魯諾夫人一般美麗而感人。但是假若我們知道收到這些書信的背景，它們的意義就更為深刻，編者如此解釋：

「Vogelsanger 在 4 月 5 日收到巴特的書信，趕往醫院，當時的布魯諾雖然虛弱但還活著並且還有意識，對他唸讀書信和巴特的請安，布魯諾臉上出現美麗的微笑，他用力握住 Vogelsanger 的手，幾分鐘後布魯諾陷入昏迷，再也沒有醒過來，在 4 月 6 日中午安詳的離開世界，巴特似乎是他在這個世界上最後的祝福。」



後記

故事似乎不是在這裡結束，因為還有一封信對巴特和布魯諾的關係作最後的結語，是一封由巴特所寫，向布魯諾夫人致意的書信（第 209 號），書信中仍可看到巴特的內心還是受到過去關係陰影的籠罩，並希望能更清楚釐清與布魯諾錯綜複雜的關係。在表達他的致意之後，提出以下的想法：

「我也曾經思考，我們之間神學差異的本質為的是什麼，及這個差異造成的結果為何。我實在很高興妳用自己的話告訴我，由他和妳的立場來看我和布魯諾的關係。從我的觀點來看，上帝引導他和我走了非常不同的路，祂不變的良善和智慧，有意讓我們成為極不相同的人，就像寓言裡的『大象』和『鯨魚』一般。如果我們當中確實有摩擦和傷害存在，那麼他在我手中所受的傷害比我受他的傷害還多…我寫這一切，是因為我已將近八十歲，因此希望儘可能讓我這部分的責任作清楚的釐清。」

4 個月之後我們拜訪布魯諾夫人，在她的痛苦當中，仍然為了最後與巴特間感人的書信往來而感到欣慰。正如 Pfarrer Hermann 教授最近與我分享（1985 年 6 月），巴特在世上的最後日子裡，向他表達已與布魯諾和解的感覺。憎惡與指控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負面的「否定」（NEIN）已經成為正面的「肯定」（JA），不管是對人或對上帝。

